

中国人民大学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性社会学研究所

Institute for Research on
Sexuality and Gender<http://www.sexstudy.org>[首页](#) | [学科建设](#) | [基础研究](#) | [应用研究](#) | [著作发布](#) | [图书检索](#) | [通俗文章](#) | [文献介绍](#) | [讨论地带](#) | [通讯文档](#)您的位置: [首页](#) -> 中国“性研究2007年第一辑”

05倾听“出柜”故事：话语冲突和社会变迁

作者: 魏伟 来源: 《中国“性”研究2007年第一辑》 类别: 中国“性研究2007年第一辑” 日期: 2007. 10. 19 今日/总浏览: 1/191

倾听“出柜”故事：话语冲突和社会变迁^[1]

魏伟^[2]

本文是一项带有自传性质的研究 (Autoethnography)，也是我的博士论文的副研究 (Wei 2006, 魏伟 2007)。中国同志运动的结构性的社会基础是我博士论文希望解答的中心问题之一，而普通公众对于同性恋问题认识的探讨，则会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有益的线索，因此，我就设计了这个小型研究。另一层是由于个人的原因，预料到我的亲戚朋友会在我2004年寒假回国之际，集中询问我的个人问题和个人研究。我就索性利用这个机会在他们面前“出柜”^[3]，然后认真看看他们到底作何反应。绝大多数对话在经过亲戚朋友的同意后，进行了录音，本文是根据整理的录音对话写作而成。我的本意是想剖析他们在对我的“出柜”提出问题和发表评论时，是如何将异性恋主义和恐同 (homophobic) 假设带入对话之中的。但是，正如我后面的访谈对话显示的那样，人们对于同性恋问题的反应是复杂而不乏反省的。一个主要发现是他们的言谈中经常包含一些看似冲突的话语和观念。通过对于这些冲突的分析，我得出本文的核心论点：人们必须运用那些仿佛自相矛盾的观念去理解同性恋现象，同时为他们对同性恋的态度进行辩护。在对话中出现的这些冲突的话语，不是由于某种情感上的“震惊”造成的，而是在目前中国文化价值和社会观念急剧变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这种变迁为人们从他们的角度出发，理解和阐释同性恋现象提供了新的语境。

一、理论视角：在今天的中国倾听“性”的故事

我是从 Ken Plummer (1995) 的故事社会学那里获得理论上的灵感的。他认为我们应该关注故事的社会角色：这些弥漫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故事是怎样生产出来的；他们是如何被解读的；他们在维护社会秩序方面发挥怎样的作用；他们又是如何与特定的政治进程联系在一起。作为1970年代以来西方同性恋运动的主导叙事，coming-out (出柜) 讲述的正是关于自我和社区的故事 (Plummer 1981, Altman 1993, Troiden 1988, Murray 1996)。到目前为止，所有的那些“出柜”的研究集中在“出柜”者身上，尤其是一种身份和社区的意识是如何在“出柜”的过程中实现的。尽管 Plummer 的书也大致如此，但他的确给予倾听者这方更多的关注。他认为听众对故事的解读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过程，而听众在这一过程中也需要拥有一些特定经济和文化资源，比如识字，知识，金钱，时间以及空间。Plummer 争辩道：“一个故事要能够讲出来，必须等到它可能被听到的时候” (Plummer 1995:120)，所以有必要去揭示那些使讲述和倾听这些故事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我的研究对象对我“出柜”反应时使用的的话语，是构成这些社会条件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Plummer 认为叙述和倾听与性有关的故事在当代社会中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晚期现代性 (late modernity) 的到来。传统的权威已经不能完全主导人们的观念，与性有关的那些故事在价值观上变得越来越模棱两可，不断体现出差异和多元化的倾向。从倾听者的角度讲，他们自身已经开始适应这样的变化，从而为他们成为这些故事的听众做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中国的现代性是一个高度“性化的工程” (sexualized project) 过程 (Dikotter 1995, Chou 2000, Farquhar

2002)。正如周华山分析的那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是一项政治经济领域的宏大工程，它也是不断产生新的身体政治话语的过程，也就是关于身体的管束和控制，增权和抵抗，身份和欲望的形成，建构和斗争的过程。”(Chou 2000:139)过去二十年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深刻的社会变迁。“开放”成为经济和其它社会领域的共同特点，包括在与性有关的领域内(Farrer 2002)。“性已经从中国社会最大的禁忌变成最狂热的话题。”(Jaivin 1994,5:3, 引自Jeffreys 2004)。性的表现和想象成为当代中国公共领域的重要特征之一，与性有关的故事充斥着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标志着过去那个清教徒式的禁欲年代的彻底决裂(潘绥铭2004, Jeffreys 2004, Farrer 2002, Farquhar 2002)。由于中国现阶段的政治体制，为人们的政治诉求给予的空间有限，因而性的表达在新时期成为一个凸现人道主义精神和表达政治观点的重要领域(Rofel 1999)。

中国古代有着丰富而久远的同性爱慕的传统。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时期，这种发生在同性之间的爱慕不仅是广为接受的(Hinsch 1990)，而且一度成为上层社会的风尚(Wu 2004)。但是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同性恋从没有成为一种身份，而是强调其作为行为，倾向和偏好的一面(Chou 2000)。由于不能导致合法生育，同性恋和一切婚外性行为都受到正统观念的排斥(Dikotter 1995)。1949年以后中国公众对于同性恋的看法以及同性恋的法律地位深受苏联的影响。同性恋被视为资产阶级的遗毒，在无产阶级的国度必须加以惩罚和治疗，关于同性恋的一切从公共领域中完全抹去(Evans 1997, Essig 1999)。近三十年来，中国政治和经济的自由化，为同性恋身份的形成提供了结构性条件。通过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城市化，传统的家庭和亲属关系在市场经济下逐步丧失重要性(Altman 1996, 1997)。国家从社会领域的撤出使人们享有了更多的自主性和对于个人生活的控制(Davis 1995, 2000)。随着经济的自由化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科技的发展，性观念和性价值也在迅速变化之中，就为多样化的性的表达方式创造了机会——无论对异性恋还是同性恋都是一样的(Farrer 2002, Altman 2002, 潘绥铭 2004)。在公共话语的层面，随着中国现代化和民主化进程的加快，顺应国际潮流，以及学术界李银河和张北川等人的不懈努力，90年代后期中国官方对于同性恋的态度开始发生重大变化。1997年1月，关于流氓罪的一些规定从新刑法中删除，警方和法庭不再适用那些条款来处置同性恋者。2001年4月，同性恋从最新出版的《中国精神障碍分类与诊断标准》中删除，同性恋不再视为疾病。上述两个事件标志同性恋在中国的“去刑事化”和“去病理化”。

上述有关文献的一个简要回顾，为这项研究的进行提供了社会和文化的语境。性价值和性观念的变迁，造就了准备倾听不同声音和不同故事的新的观众群[4]。隐藏起来的过去的同性恋传统被重新发现，尽管人们对于这个传统存有不同的解读。但却促使他们重新审视同性恋这一社会文化现象。中国研究的学者考察了当代中国同性恋问题的公共话语，由于他们的数据来源主要是正式出版物，他们倾向于呈现一个维度单一的故事画面，强调公共话语的恐同主义本质和它的意识形态功能[5]。近期的一些研究对这一倾向进行了质疑，对现今中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性进行更为细致而深入的分析(Sang 2003, Jeffreys 2004)。虽然正式出版物的研究能够揭示有关同性恋的公共话语的建构，但是它却忽略了读者的行动力(agency)，他们也是话语建构过程的积极参与者。这在今天的中国表现尤为突出，因为国家在意识形态领域已经无法完全进行控制，呈现出相当的差异和分野。在这个研究中，尽管关于同性恋的公共话语仍然是研究目标，但是我把关注的重心投向普通人，力图近距离考察人们在对我的“出柜”进行反应时如何阐明他们对同性恋现象的看法。在中国发生的变化客观上创造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使得各种新的故事能够产生，并且获得听众的回应。以“出柜”的故事为例，当一个逐渐成熟的同志社区开始形成，这种故事就到了它开始流行的时候，这是我博士论文关注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个日渐开明的“解读社区”(interpretive community)也做好准备来倾听这样的“出柜”故事，这就是本文所要着重探讨的问题。

二、研究方法：和熟悉的人作特殊的访谈

研究的导入是通过我向访谈对象现场“出柜”。整个设置类似深度访谈，但和传统的访谈方式又很不一样。整个访谈是未经任何准备的，我对于访谈对象会提出怎样的问题和做出怎样的反应一无所知。严格地讲，我并不是完全的访问者，他们也并非完全的受访者，因为角色随时都在变换。但是，主要是我对于他们的问题和评论给予积极的回应，从而推动访谈的进行和深入。除了一个以外的所有访谈在经得访谈对象的同意后，都进行了现场的录音。唯一的一个未录音的访谈，我事后做了详细的笔记。

访谈对象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所有人认识我至少10年，他们分别来自北京，上海，成都和重庆。选择这样的访谈样本，我主要基于两个考虑：第一，向我所选择的这个群体“出柜”，和向父母或者陌生人“出柜”，其中的互动过程很不相同。对于同志在日常生活所接触到的公众的部份，他们有很好的代表性。第二，因为我们彼此熟识，我会期望他们对于我的“出柜”有一个更为复杂的反应，而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回应。

我总共和八个人做了七个访谈(其中的一个是和一对夫妻同时做的)，六名男性和两名女性，都自我认定是异性恋。他们的年龄最小二十五，最大接近五十。尽管所有人的文化程度(一个研究生，四个正规本科，三个高中毕业)，职业(两个政府官员，三个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一个媒体负责人，一个职员和一个小业主)，和收入(年收入最高25,000美元，最低3,000美元)都不尽相同，但都可以大致划入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的行列。

三、研究发现：变迁社会中的冲突话语

听到我的“出柜”经历后，访谈对象在克服了最初的情感“震惊”后，很快他们就调动熟悉的话语资源，对这样一个交流的“事故”做出反应。Plummer(1995)强调人们对于“出柜”这样与性有关故事的反应，是遵循具有一定模式的。人们是从他们既有的关于性，婚姻和家庭的经历，以及他们各自不同的性别，阶级，性向和文化的立场出发，去理解和阐释他们所听到的故事。我们的对话记录显示访谈对象不断出现一些相互冲突的话语。叙事中出现的矛盾之处，我认为并非由于他们受到的情感“震惊”所致，而是由他们在变迁社会中累积起来的先前经验决定的。这个正在变迁的社会产生的种种看似冲突的话语，帮助他们理解同性恋这样的“新”事物。

(一) 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 vs. 受制于关系的自我

现有文献表明个人主义的盛行为现代同志身份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Greenberg 1988, Plummer 1995）。当中国过渡到市场经济社会后，个人主义观念已经深入人心。所有的访谈对象都声称，在不违背法律和不影响他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有追求个人自由的权利。当提到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志的生活方式时，身为律师的B说：

“我想这是大家权利意识提高的表现。我有这个权利，我就要行使这个权利。这与过去相比是一个很大的不同。以前我们总是强调奉献，其实是在说一种义务。现在，我想对于人们的权利有了更多的关注。你的事情就说明人们需要站出来，行使他们的权利。”

从这个角度看，身为同志并非完全不能接受。作为一名律师，B职业性地从权利的角度看待“出柜”。但是，Dutton（1998）曾经指出，因为推崇互相关爱和支持，中国传统看重的是个人的道德和伦理义务，而不是权利意识。以群体和谐为中心的儒家伦理，为争取个人权利留下的话语空间相当有限。西方的同性恋运动的话语中把同性恋者当作“天赋人权”的个体，这在中国无疑是行不通的，因为个人首先是作为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他们的权利相对于家庭和社会的需要是其次的（Chou 2000）。

正在发生的“消费主义革命”（Davis 2000）使“选择的自由”成为当代中国普遍接受的价值原则，所以不难理解人们更倾向运用消费主义的价值取向来看待同性恋生活方式的选择，正如A和C在各自的场合阐述的那样：

“总的来讲我理解这个，而且也不排斥... 我其实无所谓，这是你个人的事情，除非你犯了法或者举止怪异。但是，作为你的兄弟，我希望认真考虑改变这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作为个人来讲，我能够容忍和接受你，既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作为你的朋友，我希望你不要这样。（为什么？）因为它违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伦理和秩序。”

虽然个人主义思潮的上升为人们理解甚至接受同志提供了条件，但是作为一个有着深厚的个人利益受制于家庭和宗族群体利益传统的国家，自我的实现必须和一定的社会关系联系在一起。换言之，抽象的个人主义和人们选择做一个同志并不冲突，但是，当涉及到具体的社会关系时，这样的选择就变得有问题了。

（二）日益增长的多元化 vs. 对于多数的遵从

面对一个活生生的，他们非常熟识的同性恋者，绝大多数访谈对象都没有借用病理模式来谈论同性恋现象，而是依据“多数”和“少数”的逻辑来为他们自己的态度进行辩护。下面就是非常典型的评论：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我们不能说它是好，或者不好。但是，我们也许... 不能讲它和主流相冲突，至少是不同的。”（A）

“它不符合社会主流。这是我唯一能够说的。”（B）

中国的传统强调随大流，因此他们的上述反应完全能够理解。任何与多数人的行为存有偏差的举动都会受到置疑。Lunsing（1999）谈到日本人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有一个很好的观察。他说这些人的恐同和反同言论，并非出自他们心底的厌恶，而是遵从一个表达的习惯，因为他们从来就是这样谈论同性恋的。中国也是同样的情形，Chou（2000）在北京研究人们对于同性恋者的态度时，发现好奇的心态多过埋怨和憎恶。

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在过去二十年里形成了一个更为多样化的中国社会，尤其是在多姿多彩的城市生活中。制度性控制的逐步放松让人们享有了更多的个人自治（Davis 1995）。在日渐宽松的城市空间里，一个生机勃勃的都市文化向一个政府无力完全控制的更加多元化的方向发展（Davis 1995, Chen 2001, Link et al. 2002）。尽管立场不尽相同，几乎所有的访谈对象承认这样一个现实：我们的社会变得日益多元化。作为媒体负责人的E看来，如今“光怪陆离”的中国具有特别的历史讽刺性。

“现在这个社会真是光怪陆离，无奇不有。我知道成都的那些场所，象什么‘鸭吧’[\[6\]](#)和什么‘快车道’[\[7\]](#)。我们现在啥没有？是不是有意思？”

有着少数民族背景，官运亨通的D，说起他在美国学习三个月后了解的多元文化主义，侃侃而谈：

“在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里，人们就是应该有不同的声音。中国已经开始关注这个群体了... 包括艾滋病。最近温家宝总理还和一个艾滋病患者握了手。”

非传统的婚姻和家庭是目前日益增长的多元化的主要体现。

“从我个人的理解看，有这么几个原因（解释为什么同志生活方式有扩大的趋势）。一是跟风，赶时髦，中国

现在这样的人不少... 再就是社会的压力, 很多人 开始是不结婚, 然后是DINK家庭, 最终就发展到这一步... 可能是厌倦了正常的生活, 想要寻求新的方式。”(A)

尽管对于我的“出柜”发表了最为反同的言论(“同性恋就是有病, 和神经病一样。”), E却用最官方的语气, 对目前中国社会进行了精辟的总结。

“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000至3000美元的时候, 就会进入社会动荡期。人们对于民主的要求就会提出来。不同的利益群体发出不同的声音, 并且希望被听到。”

无论他们对社会的多元性有如何开明的理解, B 和 D 依然会选择遵从大多数, 当他们作为个人被牵扯进来。

“你认为你母亲会对我是同志作何反应?”(W)

“我想她会理解, 但是不会支持。”(B)

“什么是支持?”(W)

“她不会说, 你可以做一个同性恋。”(B)

“那你呢?”(W)

“我想我的立场是... 至少不反对, 如果家里人问起来。但是我不会帮你说服他们。我不会反对你这样, 其他人即便理解也会反对, 这就是我们的区别。”(B)

谈到我未来的就业前景时, 身为政府人事部门负责人的 D 说:

“举个例子, 如果我是中国社科院负责招人的, 我能理解你, 也想让你进来。但是, 其他人要说了, 这种人进来了, 你是怎样把的关? 我是理解你的, 但这个社会上只有少数人能理解, 多数人还是不理解, 所以他们就会质疑你的决定。”

(三) 禁欲主义 vs. 性的自由化

清教徒式的性压抑和性控制是社会主义中国前三十年的主流。婚外性行为比如通奸, 手淫和同性恋, 被认为是“耻辱”或者“病态”的(Dikotter 1995:181)。由于意识形态领域内严厉的禁欲控制, 性就从公共生活中消失了(Zha 1995, Evans 1997)。自从80年代以来, 性的领域迅速开放, 成为追求自由的一种替代方式。因此, 对于人们比较坦白地谈论自己的性生活, 尤其是与如今蓬勃发展的商业性性行为相关的性生活, 我一点也不吃惊。

“你怎么总是把同性恋和卖淫放在一起比较?”(W)

“因为它们都不被主流社会接受。此外, 都和性有关。一个是性取向的问题, 一个是性交易的问题。”(B)

B并没有采纳病理模式来看待同性恋的问题, 有趣的是, 他把同性恋和卖淫放在一起进行评论。这正好验证学者关于中国文化对待同性恋的论断, 即同性恋通常被理解为婚姻制度以外的一种性放纵(Dikotter 1995)。不仅如此, B暗示了他作为这个市场的潜在消费者的角色。

“我没有这样的经验, 也没找过‘小姐’。你也晓得, 我还没到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

他提出的解决当前卖淫问题的最终办法, 尽管在今天的中国还过于激进, 但也并非凭空想象。

“从法律的角度看, 我卖身挣钱, 所以是合法的收入。我一直认为将娼妓业合法化不一定是件坏事。既然你不能完全消灭它, 为什么不合理加以引导, 国家也能从中获得收益。”

在近期研究当代中国卖淫问题的书中, Jeffreys (2004) 发现针对卖淫问题的公众舆论变得多样化。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开始采纳“性工作者”的理论模型。尽管政府在卖淫问题上很大程度仍然坚持一个“过时”的框架, 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表现出绝大多数西方分析家们所不曾料到的灵活性和务实性。鉴于卖淫和同性恋作为性越轨经常被归为一类, 公众舆论对于卖淫问题看法的变化也会影响人们对于同性恋问题的理解。

人们不仅仅只是谈论这样的性。我这次中国之行的一个有趣的发现是非传统性活动已经成为相当一部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而且发展出新的话语对其进行申辩。A是人们眼中标准的好男人, 好丈夫, 和好父亲。作为一种夸耀“霸权性男子气概”(hegemonic masculinity)(Connell 1995)的方式, A谈及他的婚外性冒险, 不乏坦率。

“和我上过床的女人 超过一百个, 有的是小姐, 有的是同事。这一切并不影响我对我妻子的爱和我们之间的关系。”

A的坦白突出了性的“玩”(playing)的特征, 而这是当代中国新的性文化推崇的一点。Farrer (2002) 认为自由选择的消费主义价值观深刻地改变了人们以往对于爱和性的敏感性。性表达对“玩”的强调, 表明性选择中生育和道德取向遭到了弱化。以A为例, 性放纵——如果仅仅是“玩玩”而已——并不妨碍他成为一个好男人。

由于没有大学文凭, F在当代中国新经济区中时常感到迷惑。但是, 凭借丰富的社会阅历中, 他对这一问题作

了最具反思性的评述：

“让我们另外举个例子... 男人... 不光是同性恋男人... 你能告诉我多少人一辈子只和一个女人上过床。这在现在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象我这样，出差就是半年。如果你没有女朋友，也就罢了。如果有呢？解决不了问题，那你只有到处找小姐罗。这真的影响了哪个人的生活 and 家庭了吗？不过就是一个交易，我给你 200块，你让我玩一玩。你得到你想要的，我满足了我的需要，就这么简单。”

F的故事背后隐含着性道德逻辑的变化，用Seidman的话说，是从“绝对主义”（absolutist）转向“实用主义”（pragmatic）。前者依据抽象单一的原则进行价值判断，而后者则承认道德前提的差异，鼓励在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道德评判（Seidman 2002）。传统观念中的忠诚并不适用于F的处境，因此，在涉及有关性行为的决定时，他选择优先考虑个体需要，行为目的和可能的社会后果。

人们未必具有同性恋的个人经历和专门知识，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和我进行一个关于同性恋的对话，这是因为他们固有的在性别和性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已经足够使他们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首先，人们谈论个人私人性生活的方式表明本地的性价值和性规范发生了急剧的变化，这发生在向市场经济过渡中经济发展和政治开明的宏大背景下。它为非传统的性表达创造了机会——无论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在A、B和F的例子中，就是消费性服务。第二，访谈对象很容易把卖淫和同性恋联系起来，这需要作进一步的探讨。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兴起部分减轻了卖淫的社会污名，正如我们看到的B和F对“买卖”关系的强调。A的叙事中流露出的“玩”的性表演同样和消费主义文化注重愉悦的本质相关联，它从另一角度对参与商业性活动进行了合理化。但是，这样的“玩”是严格和婚姻区别开的，必须完全服从一夫一妻的异性恋婚姻模式。透过人们对卖淫的看法，有助于了解他们对同性恋的看法。和商业性性行为一样，从事同性恋的活动，如果只是一种正式婚姻以外的性放纵和性玩耍，那它就还是无伤大雅的。^[8]在这一点上，虽然近年来中国的性革命让人们获得了更多的性自由，但正如Dikotter指出的那样，性的观念从来没有和生育目的真正地脱离，因此基于独立自我（作为一个同性恋者/同志）的个人权利也就不会得到承认（Dikotter 1995:184）。换句话说，要求一个独立的同志身份在今天的中国仍然面临挑战。

（四）文化基要主义 VS 经济决定论

中国和国外在有关同性恋的公共话语中有许多的相同之处。我的访谈对象很容易就套用病理学模式(同性恋和艾滋病是联系在一起的)和心理学模式(同性恋是由于在异性恋的关系中遭受挫折后形成的)来解释同性恋现象和为自己的异性恋主义和恐同主义看法背书。然而，真正有趣的是他们从社会维度谈论同性恋现象时，是如何逻辑上陷入前后冲突的矛盾境地的。

和西方社会相比，同性之间在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经常会有更多身体接近和情感发展的机会，而且比异性之间的接触更加不容易被监控，因此，同性性行为可能比人们想象的要常见得多（Evans 1997:164）。毫不惊奇，六名受访者中就有三名谈到了以前自己经历过的同性情谊和吸引，但是，他们对这些经历的解读却和同志大相径庭。

“我小的时候，也喜欢男性朋友了... 象兄弟一样... 男人需要友谊... 和兄弟之情，这在中国非常普遍，那为什么我就没有发展为同性恋呢？”（C）

“这样的欲望是受到排斥的... 我在上海有一个学生，他的行为... 事实上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我知道这个已经很久了... 那时他把我当作他的偶像。如果我们回头想想他的行为，我们可以发现这样的一种倾向。举例来说，他总是希望和我很亲密。但是，在我这边，我是排斥甚至厌恶这种事情的，所以我毫不犹豫制止了他的这些行为。但这并没有影响我们的关系。我们还是一起比如旅行什么的... 他也常来成都。”（A）

“说起来很有趣。因为业务的关系，我认识了一个人，他是另外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第一次在他的办公室见面的时候，他看起来很正常，一点也不怪。下班后我们一起吃了饭。他在饭桌上就有点变化了... 他带我们去了一家叫Eddy's^[9]的酒吧，我从没去过那个地方，所以什么也不知道。但是，坐在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很怪。你知道吗？那里全是男人，而且他们看人的样子也很怪。我们都是新人，客人大多是老客，从来没有见过我们。一些人和他打招呼。他们说‘新朋友？’我觉得好奇怪哟。再坐了一会儿，我开始意识到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我没见过一个女人走进来。然后我告诉了同去的朋友，他也看出来，所以我们一会儿就离开了。”

（D）

C认为同性间的情感（甚至身体）联系和同性恋有着明显的界限。这种界限在A那里变得更有问题了：他不得不费心保持一个他所看重的同性友谊应有的社会距离。D对同性欲望的意识，在他无意进入一个同志场景后被放大了。这些受访者的故事显示同性欲望并非为同志所独有，而是每个人都有可能遭遇的一种表演，行动和潜在的可能性（Chou 2000）。建构主义认为人们的性自我（sexual selves）的形成，是不断扫描以往的经验，然后在现实世界中找寻认同的依据（Plummer 1981）。行动者（agency）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这些受访者从没有审视过自己的那些偶然的经历，直到他们遭遇笔者的“出柜”。这样的互动为他们反思自我的经历提供了新的语汇和视角，尽管他们仍然可能“监控”对于以往经类似验的诠释。

除了自我的经历，所有的访谈对象都声称从中国的古书中读过并了解同性恋现象。

“中国自古就有这种现象，我们都知道。”（A）

“我爱看古书。那个年代，玩耍童好象很正常。”(C)

“我读过大量的章回小说，里面有不少关于女同性恋的描述，都是受到性压抑。我倒不知道有男同性恋的事。”(F)

由于国家放松了对于媒体的控制，与性有关的内容的出版物一下子繁荣起来(Farquhar 2002, Farrer 2002)，同时也重新发现了一度被埋没的中国历史上的同性恋传统(Sang 1999)。但是，受访者在解读这个传统时，多少带有自身的偏见。C的认识大致是准确的[10]，但他同时暗示同性恋是封建时代的残留物。现有文献已经揭示在中国历史上女性同性恋现象较男性更加隐蔽，但F对此的评论却正好相反，正好说明了Kimmel(1994)的“恐同作为表达男子气概”(“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的观点[11]。在这个问题上，F选择忽略男性同性恋的历史传统，以便强调和保护自己的男子气概。

尽管承认中国历史上同性恋现象的存在，然而，从一种文化基要主义的立场出发，受访者都拒绝把同性恋纳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份。

“作为这个家的一员，我希望你应该保持中国的传统。这就是我们的担心。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传统的社会里。你现在做的事和我们的文化传统有不小的距离，这就是我想要提醒你的事情。”(A)

“你应该牢牢记住。我们是东方文化。我们的文化里面没有同性恋。”(F)

在官方的意识形态中，同性恋一度作为外国势力“污染”中国的象征。既然我是一个被外国“腐蚀”的活例子，访谈对象很容易把我的同性恋归罪于西方的影响。A提到在北京和上海出现一种令人忧虑的趋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同志的生活方式。中外交流是他认为的主要因素。

“为什么我说这一切是发生在中外交流的背景下呢？交流越多的地方，这种现象越普遍。”(A)

C则认为我在美国受到的教育应该直接为我变成同性恋负责。

“我真的认为你是受到你的那些教授和你所学的东西的影响。正是由于这些影响，你把你潜意识里对于男人的欲望释放出来了。这种欲望的确存在，但是必须在一定的理论框架下才能激发和扩大开来，那些理论的影响力都是很大的。”(C)

虽然中国民众对于同性恋的态度总的说来已经变得日益开明，但是他们的理解仍然带有过去年代的意识形态烙印。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公开宣称同性恋在解放了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了(Evans 1997)，而我的受访对象也准备随时把同性恋现象作为西方资本主义的腐蚀或者封建历史的遗毒进行抨击。

然而，访谈对象也都意识到经济变化对于独立的同志身份形成的影响作用。

“这个现象是在经济发展和中外交流的大背景下发生的... 中国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这种事情就要开始出现。”(A)

C应用在研究生院里的经济学训练来理解同性恋现象，格外得心应手。

“肯定有它的社会基础。为什么这种事在西方更普遍？我一直相信马克思说的话，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所以为什么在美国有这么多同性恋？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水平，人们可以不需要家庭了。人们想要更多的自由。为什么中国人现在敢说话呢？他们吃饱了饭，就要民主了。”

尽管G没有受过很多的正规教育，她在谈论同志身份的形成时，却显得很有洞察力。

“你说到成都的那个(同志)组织。我觉得他们一定能够比较独立，所以能生存。一方面，他们有这个意识。他们也更能吸收外来的东西。或多或少，是追求他们个人的自我。”

研究文献表明同性恋身份是西方现代社会的产物，而且历史也不长(Adam 1985)。在非西方社会中，同性恋行为一直都存在(Murray 2000)。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一方面，我的访谈对象承认同性恋现象(作为一种行为)在中国历史上存在；另一方面，他们拒绝把同性恋(作为一种身份)纳入中国的传统文化。社会学家已经对于滋生现代同性恋身份和社区的社会因素进行详尽的研究，比如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变化的家庭关系和更加灵活的家庭模式，单身的可行性，快速的城市化，和下降的出生率(D'Emilio 1983, 1998)。其中的一些关键因素，已经被我的访谈对象指出。因此，尽管他们还是倾向于用文化基要主义来解释同性恋现象，面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其解释力的弱化，他们不得不运用与文化基要论相矛盾的经济决定论来解释目前出现的新趋势。

四、结语：新近呈现的历史，新近流传的故事

故事社会学让我们从文化和历史的层面去理解故事的讲述和倾听。在某一个历史的时刻，一些新的故事开始进入公共话语，去丰富我们的想象和生活，然后进一步强化那些社会和历史的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最初促成了这些故事的生产和流传。在美国70年代以来的同性恋解放运动在推进社区建设，提升群体意识方面发挥了关键的

作用。但是，“出柜”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在中国特定国情下的作用是存有争议的。Chou(2000)对中国本土的同性恋身份——“同志”进行了复杂而深刻的讨论。因为中国的同志身份是和中国传统关于性别的观念紧密联系起来的，而且与其他社会身份交织在一起，所以“同志”作为一种身份，是拒绝“出柜”和“对抗”策略的。尽管Chou的论述让我们对于跨文化视角下的同性恋身份和同性恋身份政治有了更为复杂的理解，它难免会招致对其文化基要主义倾向的批判。正如我的这项研究试图说明的那样，“出柜”策略所需要具备的一些核心历史要素比如个人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城市化，和权利观念，已经出现在我的访谈对象的话语中，某种程度上讲，也体现了当前公共话语的现状。

但是，人们对于我“出柜”的反应不是黑白分明的。上面的访谈资料显示冲突性的观念常常出现在他们的谈话中。在中国这样一个经历巨大经济发展和文化变迁的国度里，即便性这样相对私密的领域也开始发生变革。传统的道德界限不断受到挑战和冲击，开始变得模糊。讲述和倾听“出柜”这样与性有关的故事，不再是对“真我”的一个简单明晰的发现和理解，而是蕴含了争议和反论。作为故事的听众，我的访谈对象不得不运用一些看似冲突的观念去和我进行沟通；从另外一层意义上看，他们也是在试图理解他们自己充满变数和无常的现实生活。

参考文献

- 李银河. 1998. *同性恋亚文化*. 北京: 今日中国出版社.
- 潘绥铭. 2004. *当代中国的性行为 and 性关系*. 北京: 社科文献出版社.
- 魏伟. 2007. “城里的“飘飘”: 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社会*, 1
- Adam, Barry D. 1985. “Structural Foundations of the Gay World.”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y and History* (no 27): 658-71.
- Altman, Dennis. 1993. *Homosexual: Oppression and Liberation*.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 Altman, Dennis. “Rupture or Continuity?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Gay Identities.” *Social Text* 14 (1996):77-94.
- Altman, Dennis. “Global Gaze/ Global Gays.” *GLQ* 3 (1997): 417-36.
- Altman, Dennis. 2002. *Global Sex*.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Chen, Nancy N. 2001. *China Urban: Ethnographies of Contemporary Cultur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Chou, Wah-shan. 2000. *Tongzhi: Politics of Same-Sex Erotic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New York: Haworth.
- Connell, R. W. 1995. *Masculin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Emilio, John. “Capitalism and Gay Identity”. In *Power of Desire: The Politics of Sexuality*, ed. Ann Snitow, Christine Stansell, and Sharon Thompson, New York: The Monthly Review Press, 1983.
- D’Emilio, John. *Sexual Politics, Sexual Communities: The Making of a Homosexual Mino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40-1970* (2nd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 Davis, Deborah, Richard Kraus, Barry Naughton, and Elizabeth J. Perry. 1995. *Urban Spaces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tential for Autonomy and Community in Post-Mao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vis, Deborah. 2000.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kotter, Frank. 1995. *Sex, Culture and Modernity in China: Medical Sci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Sexual Identities in the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Dutton, Michael. 1998. *Streetlife China*.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Evans, Harriet. 1997. *Women and Sexuality in China: Female Sexuality and Gender Since 1949*. New York: Continuum.
- Farquhar, Judith. 2002. *Appetites: Food and Sex in Postsocialist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Farrer, James. 2002. *Opening Up: Youth Sex Culture and market Reform in Shangha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reenberg, David F. 1988. *The Construction of Homosex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Hinsch, Bret. 1990. *Passions of the Cut Sleeve: The Male Homosexual Tradition i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Jeffreys, Elaine. 2004. *China, Sex, and Prostitution*. London: RoutledgeCurzon.
- Kimmel, Michael. 1994. “Masculinity as Homophobia” In. Brod, Harry and Michael Kaufman. Ed. *Theorizing Masculinities*.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 Link, Perry E. and Richard Madsen. 2002. *Popular China: Unofficial Culture in a Globalizing Society*.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Lunsing, Wim. 1999. “Japan: Finding Its Way? ” In. Adam, Barry D., Duyvendak, Jan Willem, and Andre Krouwel Ed. *The Global Emergence of Gay and Lesbian Politics: National Imprints of a Worldwide Movement*.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 Murray, Stephen O. 1996. *American Ga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Murray, Stephen O. 2000. *Homosexualit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lummer, Kenneth. 1981.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Homosexual*. London: Hutchinson.
- Plummer, Kenneth. 1995. *Telling Sexual Stories: Power, Change, and Social Worlds*. London: Routledge.
- Rofel, Lisa. 1999. “Qualities of Desire: Imagining Gay Identities in China”. *GLQ* (no 5):451-474.
- Sang, Tze-lan Deborah. 1999. “Translating Homosexuality: The Discourse of Tongxing’ ai in Republican China.” In. Lydia He Liu Ed. *Tokens of Exchange: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Sang, Tze-lan Deborah. 2003. *The Emerging Lesbian: Female Same-Sex Desire in Modern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Seidman, Steven. 2002. *Beyond the Closet: The Transformation of Gay and Lesbian Life*. New York: Routledge.

Troiden, Richard. 1988. *Gay and Lesbian Identity: A Sociological Analysis*. New York: General Hall.

Wei, Wei. 2006. "Going Public: The Produc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Queer Spaces in Postsocialist Chengdu, China." Dissertation,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Chicago, USA

Wu, Cuncun. 2004. *Homoerotic Sensibilitie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New York: RoutledgeCurzon

Zha, Jianying. 1995. *China Pop: How Soap Operas, Tabloids, and Bestsellers are Transforming a Culture*. New York: New Press.

[1] 本文是根据作者2005年在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举行的第七届芝加哥民族志研究年会（7th Annual Chicago Ethnography Conference）宣读的论文“Coming-Out Real Time: Story-Hearing, Contradictory Discourses, and Social Change”修改和充实而成。

[2] 上海大学社会学系讲师。

[3] “出柜”是英文中coming out of the closet的直译，意思是同性恋者公开身份。

[4] 最典型的事例就是以情感诉求为主的电视访谈节目在中国的流行，比如上海电视台时尚生活频道的《心灵花园》栏目。

[5] 事实上，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媒体对于同性恋的报道和表现已经逐渐发生转变，最为显著的变化发生在2005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调查》栏目在一年之内，对于中国同性恋人群和艾滋病状况进行了三次报道，尤其是2005年8月8日播出的第三次特别报道《以生命的名义》，第一次从尊重人性的角度对于同性恋者的生活进行了表现。新华社下属的《环球》双周刊在其8月1日出版的那期杂志的封面出现了显著标题《30, 000, 000: 中国同性恋之困》，本期关于同性恋的特别系列报道不仅探讨了当代中国同性恋人群面临的诸多困境，而且也对此一人群数目之巨大给了一个官方的说法。数周之后，复旦大学宣布即将开设《同性恋研究》的本科生全校公选课。这门课程将邀请有关专家和同性恋者一起探讨与同性恋相关的健康，法律和社会事宜。尽管公选课的名额仅有100名，却吸引了远远超出这个数目的学生的兴趣。在这门课开设的过程中，它始终的中国媒体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

[6] 男性提供性服务的酒吧。

[7] 专门为陌生人寻找“一夜情”提供方便的场所。

[8] 这种想法在中国的同性恋者中相当普遍，这也是解释了为什么许多同志仍然会选择和女性结婚，过一种双面生活（double life）。有关案例见李银河（1998）和Wei（2006）。

[9] 上海一家有名的同性恋酒吧。

[10] 比如Wu（2004）认为同性欲望的表达在明清时代成为一种上流社会的时髦风气。这种同性关系是不平等的，一般发生在贵族绅士和年轻戏子，或者是殷实文人和他们的侍童之间

[11] Kimmel认为恐同是我们文化中定义男子气概的中心原则之一。男人由于担心被认为是同性恋，所以避免对于同性恋有关的事项表现出任何兴趣或者关联。

关闭窗口

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请勿转载，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我们。